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俄文版的翻译与传播¹

周露

摘要: 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成功入选2016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本文就该专著在汉译俄过程中所秉持的翻译理念、翻译度与合译模式进行了总结与探讨。首先,秉承“和而不同”的翻译理念,在翻译时力图确保两种文化在交流上的畅通,同时也强调其异质性。其次,在翻译度的把控上,秉承中国儒家哲学中庸义理的传统,力求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第三,在中国文学外译合译模式的探讨与把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本文还就该译著在俄罗斯的出版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俄文版; 和而不同; 翻译度; 合译模式; 传播

作者: 周露, 文学博士,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俄汉翻译研究。邮箱: zhouluye2004@aliyun.com

Title: On Translating & Diffusing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Russia

Abstract: Professor Nie Zhenzhao's academic monograph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ussian translation) was successfully selected for the 2016 Chinese Academic Translation Program.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concept, translation degree and joint translation mode of the

1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批号: 21&ZD264】的阶段性成果。

monograph in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Russian. First of all, we adhere to the idea "harmony and difference", trying not only to ensure the smooth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but also to emphasize its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Secondly, as the degree of translation is concerned, we adhere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the mean of truth and strive to be impartial and unparalleled. Thirdly, some useful exploration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iscuss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translation mo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n, we summariz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 Russia.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Russian version; harmony and difference; translation degree; co-translation mode; diffusion

Author: Zhou Lu is Ph.D. an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Russi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zhouluye2004@aliyun.com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是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继 2013 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后，又于 2016 年成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著作外译项目（俄文版）”。该译著已于 2021 年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在俄罗斯出版发行，这是中华学术走出去的历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批评理论，是一种从伦理学视角出发来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它将道德和伦理因素视为文学的核心因素，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和批评家的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标志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同时，该书以一些重要的文学文本为考察对象，进行角度新颖独到的伦理批评，为我国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学术范例，这必然会对相关的学科产生积极的影响。”²因此，该书代表了当代中国学界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最新成果，有必要向

2 吴笛：《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9-23页。

外译介。该书的外译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地对外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最新发展动向与发展水准。

随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文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不仅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新话语，而且与超文本结构与接受美学相呼应。俄罗斯文学和经典文学批评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尤其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与俄罗斯经典文学批评遥相呼应。它不仅可以吸引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的关注，而且也可以在文学批评领域与哲学研究领域之间架起一座中俄两国对话的桥梁。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具有迫切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俄罗斯创办最早的大学，成立于1724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也很久，可追溯到1824年。现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高校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俄罗斯各大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店出售。同时出版社还拥有独立书店和书亭销售网络，可以自行组织发行、销售各类学术著作与出版物。“如果你有效并充分利用国外出版机构及主流媒体进行出版、评论和推介，那么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力和传播力就会得到明显改进。”³由知名出版社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一书，充分体现了该书的理论水准得到了俄罗斯学界的肯定。

笔者非常荣幸地成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汉译俄项目的负责人。五年来，本人及团队成员秉承“质量第一，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对待本书的翻译工作，以确保这部体现了中国学术界首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能够比较完美地推介给俄国学术界。

在具体的翻译与出版过程中，本翻译团队与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努力与尝试。下面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的翻译策略与出版过程及其在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与学界同仁们进行分享。

3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71-75页。

一、秉承“和而不同”的翻译理念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是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本书所使用的素材及理论都是参照西方和中国伦理批评的相关内容完成的，这个视角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新颖的，因此很有译成俄语的必要，但这又恰恰构成了翻译的难点。相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理论，中国的伦理批评内容、传统文学经典及代表人物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本书被译成俄语后，读者是以俄语为母语的学者和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因此，就“怎么译”而言，译文是否具有可通约性，是否能实现有效交流从而使译作具有普世价值，值得我们思考。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我们秉承“和而不同”的翻译理念。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和”指的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混合，反映了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指的是相同事物的累积，反映了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充分揭示了事物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兼收并蓄的情怀和气度。这一理念在俄汉翻译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力求尊重汉语原作、尊重原语文化，同时也不妄自菲薄，使中俄文化在对话过程中保留个性。“‘和’体现在翻译时力图确保两种文化在交流上的畅通，从而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及共存共荣；‘不同’在于在保证可通约性的同时强调异质性，从而避免文化简化主义。”⁴

正如杨宪益所言：“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习俗、思想内涵，因为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都有差别。”⁵在贯彻“和而不同”这一翻译理念的具体操作层面，我们怀着强烈的读者意识，采取适当补注的翻译方法，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进行增补说明。例如，在第二章第八节的“《西游记》与中国志怪小说”中，译者对《西游记》的主要情节与孙悟空的身世做了补充说明，对志怪小说的内涵与种类也

4 夏婉璐：《译作的普世价值与译介的有效性》，《中国翻译》，2016年第4期，第49-53页。

5 杨宪益（等）：《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做了界定，以帮助俄罗斯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分内容。在第十四章的“伦理演变与中国五四时期的诗歌”一章中，大多数俄罗斯读者对“五四时期”的概念不甚了解，这就需要译者对“五四时期”这一概念及其当时的风云人物（如胡适等）加以注解，以避免俄罗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困惑。另外，在第七章的第四节有这么一段话：“2005年，有艺术家为秦桧夫妇塑造站像并在上海一家艺术馆展出，作品名称叫做《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意为秦桧平反，引起一片舆论哗然。”⁶秦桧与岳飞这两个人物，对中国读者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俄罗斯读者并不了解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了解作品名称《跪了492年，我们想站起来喘口气了》的真正内涵。因此我们在注解中做了说明，指出岳飞是民族英雄，而秦桧是诬蔑陷害岳飞的大奸臣。老百姓专门在杭州岳庙塑了秦桧夫妇跪在岳飞前的塑像，以表达人们对奸臣的唾弃。这样一来，俄罗斯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章节的内容。

同时，我们还采取“以俄喻中”的翻译方法，对所译的小说与人物进行补充说明，用俄罗斯读者所熟悉的小说与人物和所译的小说和人物进行跨文化的类比，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加强读者的理解力。以对胡适这个人物的注解为例，在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我们把他类比为“中国的普希金”。通过这一形象的类比，能够让俄罗斯读者比较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在翻译《聊斋志异》这部小说名时，我们把它类比为“中国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里）”，这样一来，俄罗斯读者的接受度就大大提高了。

“就翻译本身而言，它既有纯粹语言转换的功能，同时也有着跨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功能，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⁷在汉译俄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牢牢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我们尽量追求中俄文化之间的“和谐”而非完全相同，只有“和”才会产生生命力，才能促进发展。中俄文化之间的差异无疑会给文学伦理学术语翻译的转换与接受造成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3页。

7 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第5-13页。

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基础，充分理解差异、寻求沟通的有效途径，就会有效地消除中俄文化之间的鸿沟，进而推进两国文化的共同发展。

二、坚持翻译度大而不偏的原则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在翻译度的把控上，我们秉承中国儒家哲学中中庸理的传统，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之道要求人们遵循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至善状态，它是本体论、方法论和伦理观这三者的融合。”⁸在汉俄语系的转换中，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翻译度可以较大；但译文仍应遵循原文的中心思想，译者不能擅自增加或减少内容，也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气与修辞风格。翻译度过小容易造成硬译、死译，翻译度过大则容易造成胡译、乱译。为了使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得到更好的接受，译者应力求做到删减适宜、恰到好处。

俄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个不同语系在词法、句法、修辞、逻辑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许渊冲在谈到西方对等翻译理论时说：“西方语文如英、法、德、俄、西等，约有90%的词汇有对等词。所以西方语文互译时基本可用对等译法。但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大不相同，大约只有一半词汇有对等词，所以等译论只有一半可以应用于中西互译。”⁹况且，中西语法的不同，主要还在在句子内部的结构。在西方语言中多复合句，可以很长；而汉语多单句，往往很短。因此，在进行汉俄互译时，译者应该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实现最大程度的翻译。徐行言写道：“西方句子的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句子内部的各种成分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一般来说不管句子有多长都不会妨碍表达和理解。而汉语的字在句法结构上是一种个体，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受一种统一的形式规则的支配，句子的构成和理解主要依靠语义的方式，如果一个句子过长就

8 淳柳，王书亭：《论中庸思想对重建传统翻译理论体系的启示》，《中国语言文字》，2010年第8期，第232-239页。

9 许渊冲：《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中国外语》，2014年第5期，第10-15页。

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结构混乱和语义不清。”¹⁰

针对汉俄句子的语法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遵循翻译度相对较大但不偏离的原则，在注重保留原作风格与精神的同时，将原作句子和段落加以重组或拆分，按照俄语语法特点重新调整句子结构，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例如形动词和副动词是俄语中特有的语法现象，特别适合俄语书面语的表达。在翻译学术著作时，如果能恰如其分地使用形动词和副动词的表达方式，就能增强俄语语言表达的规范性与语言表现力。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第一章第26页有这么一段话：

韦勒克、沃伦指出的另一种观点，是把美学价值和学术声誉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只强调作品“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而不管作品的题材，认为文学是由“名著”构成的，历史上那些伟大哲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道德家、政治家甚至一些科学家的著作，都属于文学。¹¹

在这段文字中，汉语使用的是并列句，使用了一系列并列动词：“作为……标准、强调、认为、属于”，而在译成俄语时，我们根据俄语的表达方式，运用了副动词“отмечая、считая”，并且把“认为”之后的句子译成了两句以“что”引导的补语从句，从而使译文显得更加紧凑，符合俄语书面语表达习惯。译文如下：

Другая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также приводимая Веллеком и Уорреном, называет эстетическую ценность 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ую репутацию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критериев, отмечая важнейшим "высокое качество исполнения текст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их темы, и считая, что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стоит из "знаменит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что к литературе принадлежат такж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философов, историков, богословов, моралистов, политиков и других ученых.

10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1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因此，在翻译中秉承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把握好翻译的度，尽量做到大而不偏，就能很好地提高译文质量，为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提供极大的便利。

三、尝试中外学者合译的外译模式

“中译外事业其实是需要所有类型译者的共同合力，这样才可以立体、全面、准确地传达‘中国声音’。”¹²佛经的汉译始于东汉，绵延十个世纪。明末清初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也传入了近代科学，揭开了科技翻译的序幕。期间中外合译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徐光启携手共译的《几何原本》尤其为人称道。因此，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从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再到晚清的小说翻译，中外合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了当代，杨宪益与戴乃迭伉俪、葛浩文与林丽君夫妇成功的合译更是成为译坛佳话。

合译的模式多种多样，本文所指的合译限定于中国译者与域外译者的合作。翻译的过程大致可分为理解与表达两大步骤，中外人士合译的优越性在这两个步骤中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外译者的合作既能真实地再现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又能保证译文地道流畅，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满足目的语国家读者的审美要求和期待，从而保证译作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因为中外译者的合作“整合了双方的语言文化优势，有助于克服独立翻译时的障碍，提高译本的目标语兼容性。”¹³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袁锦翔先生就对中外人士合译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一是要慎选合作伙伴；二是双方须志同道合，有献身于译事的抱负，能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三是要充分发挥双方的长处。¹⁴对此笔者深以为然。本团队在本次翻译实践中遵循上述要求，在中国文学外译合译模式的探讨与把控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

12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71-75页。

13 吴贇，蒋梦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模式研究——以残血小说译介为个案》，《外语教学》，2015年第6期，第104-108页。

14 袁锦翔：《论中外人士合译——兼谈文献中译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第53-58页。

的探索,收获良多。本翻译团队由来自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三位专家组成。团队负责人具有良好的文学专业背景与俄汉语翻译实践经验,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与翻译工作30多年,精通俄语、汉语,了解中俄文化的异同,能够很好地主持翻译工作,并在其中起到协调、沟通作用。一位俄罗斯专家为文学理论专业教授,发表有关文学理论与民俗学论文多篇,能够精确地把握文学理论方面的术语与表达法,确保理论著作翻译的准确性;另一位俄罗斯专家为知名汉学家,曾在中国高校任俄语外教多年,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文多篇,他可以敏锐地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文化与用词方面的偏差,使译文质量更上一层楼。因此本翻译团队人员的组合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翻译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优势互补作用。

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先由中文为母语的译者译完初稿,再由俄语为母语的文学教授进行修改,然后由俄罗斯汉学家进行汉俄语对照修改、润色,最后再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全文通稿。我们常常为找到一个精准对应的专业术语而绞尽脑汁,进行无数次的探讨与争论。我们碰撞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中俄文化差异以及一些修辞的内涵与外延上。我们三人虽然身处三地,但经常通过微信、QQ、Zoom视频会议等现代化的电子通讯设施即时沟通、无障碍交流。经过五年来的翻译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合作模式是比较理想的,能够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既做到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著精髓,又能够符合俄罗斯人的阅读习惯,为该专著在俄罗斯的顺利出版与发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团队成员类型的多样化与相互配合对于学术专著翻译的成功与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者在合译过程中实施优势互补,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优质翻译资源,进而有效地提升外译质量与接受效果。中译外作为国家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关键之一。《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汉译俄的翻译过程,也是中俄学者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碰撞的过程。

四、俄译本在俄罗斯的出版与影响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作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享有良好的口碑与学术声誉。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依旧抱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坚持质量第一。例如这次在与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艰苦的谈判过程，来往邮件二十几封，历时两个月，直到最后一刻才签下来。首先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原著的 PDF 版、试译稿以及翻译团队构成人员的信息。他们专门邀请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副系主任、汉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对原著与试译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审核，最终原著与试译稿都得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评价，认为值得在俄罗斯出版，他们这才同意出具出版意向书。对合同条款审查也特别严格，他们学校的法务部门对合同文本审查了两次。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社长列别德金娜女士终于签了字，盖了章。在拿到合同的那一刻，我们真是太高兴了。由此可见俄罗斯知识分子严谨的办事作风。

本书的出版过程非常漫长，可谓一波三折。在译者将译著上交给俄方出版社之后，俄方首先还是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副主任、汉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对译稿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审核，然后委派资深编辑维拉女士进行单独对接。维拉女士非常认真负责，她先单独对译稿进行了三个月的逐字逐句审校，然后又与译者团队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了三个月的沟通与交流，最后才发往印刷厂印刷。在编辑过程中维拉女士发现了不少编排上的小错误，例如双引号的使用、引文的出处等。虽然她不懂汉语，但是她会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找出原著印刷中出现的微小错误。例如她根据作者列出的书籍目录年代，发现《啊，荒野！》的写作年份印错了，不是 1923 年，而是 1932 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尤为重要的是，书后附录中的专有名词解释是按照中文拼音字母顺序编排的，译成俄语后如果还这样排，就显得没有逻辑性。俄语编辑提出了这个问题，经与作者商量后，本来准备按照内容主题来排，但最终还是决定按照俄语的字母顺序来排，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通读译稿之后，伊戈尔·沙伊塔诺夫教授和加林·提哈诺夫教授欣然提笔为俄译本撰写序言。沙伊塔诺夫教授是俄罗斯著名文学研究杂志《文学问题》主编、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当代比较文学

研究中心主任，而提哈诺夫教授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欧洲科学院院士。他们两位都是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学术造诣深厚，享誉世界。二位教授能够为译著写序，我们深感荣幸并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沙伊塔诺夫教授首先指出：“在后现代的众说纷纭中，中国学者听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声音，并将此宣布为人文科学的新方向。中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聂珍钊教授阐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原理，他负责组织并召开了在中国、韩国、日本、英国和爱沙尼亚举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大会。”¹⁵接着他提到，中国伦理学批评是根据过去几十年来世界文学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而做出的选择。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聂珍钊教授首次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研究范围囊括了哲学论证以及伦理学批评方法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应用。沙伊塔诺夫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雄心勃勃，涵盖了整个理论思考的范围。文学伦理不是用来发掘其意义，而是与其他功能一起综合应用于哲学研究以及政治现实。”¹⁶他指出，聂珍钊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融入了西方的批评思想，在中国伦理哲学的语境下“逆流”而生。《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理论思想来源于神话和哲学经验，融合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可获得的一系列西方思想源泉。在序言的最后，沙伊塔诺夫教授高度评价了本书的理论价值与道德内涵。他写道：“聂珍钊教授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道德价值如此轻易而且迅速流失的现代世界，他对当今的世界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中所呈现的人提出了伦理要求。”¹⁷

提哈诺夫教授首先对聂珍钊教授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学者，也是人文学科领域少数几位获得国际声

15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 с.11-12.

16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 с.12.

17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 с.14.

誉的中国学者”¹⁸。接着提哈诺夫教授回顾了聂教授的文学研究历程，指出聂教授早年从事英语文学史研究，他的论文和第一部专著均论述托马斯·哈代。之后，他的研究涉猎广泛，涵盖了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语小说和诗歌。他的研究博大精深：从索福克勒斯到渥兹华斯到托尔斯泰，从海明威到16世纪及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学。对于任何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这都是引以为豪的事。提哈诺夫教授写道：“聂教授不仅凭自己广博的学问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概念性思考的能力以及提出新方法、创造新术语的能力。他能够对文学提出不同的看法，且能令中国的文学学术研究比肩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学学术研究，这部著作就是这种原创力的明证。”¹⁹提哈诺夫教授认为，聂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独创性在于，他试图把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从评论者/读者当下的观点出发做出评判；而后者则着眼于理解文学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演变，即视文学为一种直面和解决伦理两难的工具，围绕的是善与恶、责任与享乐、忠诚与自由等问题。在他的理论视域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只有助于解释人作为生物存在的起源，但无法解释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尤其不能解释人的创造性特征，即人具有创作歌曲、诗歌和散文（小说）的能力。人的这些创造性特征也无法通过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劳动起源说来阐释。在聂教授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并非始于“自然选择”，而是始于后来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令人类摆脱了“伦理混乱”王国，进入了“伦理启蒙”王国，从而促成了人类从动物向人的过渡。最后，提哈诺夫教授总结道：“聂教授的大胆尝试既是对文学发生原理的阐述，同时又是对诗学问题的敏感回应，就更广的伦理关切而言，其思想发人深省，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充分表明，当前中国的文学研究

18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 с.15.

19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 с.16.

充满活力和雄心，它必将引领读者踏上一次迷人的思想之旅。”²⁰哈诺夫教授可谓高屋建瓴地肯定了聂教授理论的创新意义与引领作用。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在俄罗斯由知名出版社出版与发行，必将有力地推动与促进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推广。本书出版之后，除了按照俄罗斯出版法规定的给俄罗斯相关部门与各大图书馆的预留册数外，经与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协商，还特意拨出180本书，由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直接寄往俄罗斯的90家图书馆，将图书无偿赠予这些图书馆。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俄译本不仅已经出现在列宁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这些著名图书馆的书架上，也已经出现在诸如奥伦堡这样俄罗斯的腹地城市以及符拉迪沃斯克这样的远东城市的图书馆目录上。这些书将如星星之火，将中国学者的智慧与杰作传递给俄罗斯的读者，扩大本书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俄译本一经出版，就受到了俄罗斯知识界的欢迎与重视。俄罗斯电影与电视学院的柳叟教授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脸书上以及学院的网站上对该书进行了推荐，立刻就有朋友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该书。他还给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独立报的书评周刊写了有关该书的评论，该书立刻被被列入俄罗斯年度最佳书籍之一。俄罗斯作协第一书记瓦西连科女士也对该书做出了较高评价，认为该书在中俄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助于帮助俄罗斯作家与学者了解中国本土原创的文艺批评理论，对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作用。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劳拉女士对该书在俄罗斯出版表示祝贺，对中国同行独创的文艺理论表示非常感兴趣，将进一步阅读与探讨。

俄罗斯最权威的文学批评杂志《文学问题》在2023年第2期上刊登了柳叟教授撰写的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书评文章。柳叟教授首先从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勃洛克的诗句“俄罗斯是斯芬克斯”入手，指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出版的必要性。他认为，以中国人文思想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知识

20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 ун-та, 2021. с.17.

理论和概念为基础，中国伦理学批评展示了其方法论的选择。聂教授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为素材，展示了如何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分析中外经典作品。在书评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聂教授所提出的斯芬克斯因子，斯芬克斯因子是人在伦理选择阶段所必定拥有的人性二元性的象征。通过斯芬克斯因子作者探讨了文学产生的来源和本质，阐释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斯芬克斯因子在奥斯卡·王尔德、海明威等作家作品的经典人物形象身上的体现。柳叟教授对孔子的儒家学说也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道：“斯芬克斯因子通过道德限制克服了禁忌，孔子学说及其礼仪自律在书中通过诉诸英美传统伦理批评得以体现，这使得对世界经典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解读成为可能。”²¹

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汉译俄属于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只有承认并保护中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中俄文化体系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展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采取了“和而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翻译度的把控上尽量做到大而不偏。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母语和目的语，更要深入了解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并尽量采取各种方式加以弥补，如采用适当补注、以俄喻中等方法，使译文既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又能被俄罗斯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让俄罗斯读者真正理解原创的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形象。

在我国翻译史上，中外人士合作翻译具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在中俄交流合作频繁、电子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利用好这一合作模式。合译既可以加深译者对原作真义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一些明显的差错，还可使译文更加地道流畅，满足俄罗斯读者的审美需求，从而使译著更易被目标语国家读者所接受。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在俄罗斯的出版与发行，必将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我们将乘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出版的东风，加强与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的

21 А. Люсий. Книжный разворот,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2023 / № 2, с. 211.

合作，举办各类研讨会，加大宣传力度与推广力度，让更多的俄语读者了解这本书，了解中国学者在文学伦理学批评领域的学术成果，为增强中俄学者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淳柳，王书亭：《论中庸思想对重建传统翻译理论体系的启示》，《中国语言文字》，2010年第8期。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
4. 吴笛：《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5. 吴赟，蒋梦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模式研究——以残血小说译介为个案》，《外语教学》，2015年第6期。
6. 夏婉璐：《译作的普世价值与译介的有效性》，《中国翻译》，2016年第4期。
7.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
9. 许渊冲：《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中国外语》，2014年第5期。
10. 杨宪益（等）：《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
11. 袁锦翔：《论中外人士合译——兼谈文献中译外》，《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
12. А. Люсый. *Книжный разворот*,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2023 / № 2.
13. Не Чжэньчжао. *Введение в этиче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критику*/ пер. с кит. Чжоу Лу, науч. ред. перевода А. А. Родионов, предисл. И.О. Шайтанова, Г.В. Тиханова. —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21.